



江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

信息化与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

肖文海 / 著

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研究者的注意，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五”计划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以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信息化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日渐增多。

XINXIHUA YU JINGJI SHEHUI
XIETIAO FAZHAN DE ZHANLUE XUANZE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江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

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战略选择

肖文海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肖文海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

ISBN 7-80207-264-6

I. 信... II. 肖... III. 信息工作—关系—社会发展—研究 IV. G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3966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卢小生

技术编辑: 杨 玲

责任校对: 郭红生

787mm×1092mm/16

10 印张

17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0.00 元

书号: ISBN 7-80207-264-6/F·25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序

公元 676 年，唐代诗人王勃去交趾探父，途径洪州（今江西南昌），在都督阎伯屿的盛宴上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其中有“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赞誉江西的佳句。千年的历史证明，王勃之言并非客套的溢美之词，而是据实之言。从盛唐至宋，江西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唐宋八大家江西占了三家。从长江经鄱阳湖赣江，翻越大庾岭经梅关入广东，商旅不绝，十分繁荣。近代的江西，志士仁人辈出，尤其是土地革命时期，江西籍的革命烈士（有姓名记录者）达几十万人。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又逢盛世，江西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又临新机遇。京九铁路开通，大大改善了江西的区位条件，当初“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优势重现，“雄州雾列，俊彩星驰”胜景盛况再来，江西这块交织着历史文化沉淀和革命传统的红土地，将展现新的风采。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理、工、法、文、农、艺术学科兼有的新型多科性经济类大学，始建于 1923 年。学校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在江西有优势，在华东有特色，在全国有影响”的第一流高等财经学府。作为学校发展规划的一部分，我们编辑出版《江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简称《学术文库》），以期展示和检阅我校教师的科研成果，推动我校科研工作和学科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学术文库》将收录我校专家学者多年潜心研究获得的学术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优秀研究报告，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力作。它们的内容涉及经济、管理等学科前沿的许多重大问题，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江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将成为我国经济、管理科学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

在此，我特别要感谢经济管理出版社卢小生先生和各位编辑，由于他们对经济、管理科学学术研究的深刻理解和大力支持，我校的《学术文库》才得以顺利问世。

史忠良

2004 年 9 月 1 日

导 言

我之所以选取《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这个题目，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自西方经济学引入我国后，学界对于实证分析方法多有偏爱，这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但在基本理论的选择上，似有全盘西化之嫌。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就是过于重视“市场”，而对“社会主义”所体现的“以人为本，关爱性”关注不够。实际上，对于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型经济国家，市场作用发挥是一方面，过于重视市场理念，凡事以“市场调节”、“不干预”、“由市场决定”的标准来评价现行政策，是一种认识问题的简单化倾向。正如高鸿业老师所指出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尤其是我国过去的长时期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目前也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软件^①。信息化问题既涉及市场有效运行的硬件，又与市场运行的软件相关，研究信息化发展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必有助益。

第二，信息化发展问题本身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生产关系问题。或借用制度经济学术语，生产的一定的物理属性与技术水平决定了交易费用的性质，对于信息化所导致的人们之间竞争合作关系及其均衡方向进行深入探讨实有必要，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第三，我国的信息化实践已有近三十年历史，相关问题也有所暴露，尤其是一些道德有所欠缺者利用国家政策上的漏洞骗取优惠，而广大农民和下岗工人难以得到知识经济外溢性的良好效果。如何推进中华民族崛起，这是一个现实课题，对此宜加以总结，以有利于这项工作的持续推进。

第四，信息技术的扩散与运用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却是“数字鸿沟”的广泛存在，广大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落后，收入

^① 国家教委高司组编、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820页。

状况低下，仅处于温饱水平，如果说“数字鸿沟”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得出的政策结论是否就是：在农村地区政府更应当关注的是发展适用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而先进通讯技术的推广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发展优先序列的后位的，这一问题应该有一个严肃的理论分析。

我一心向学，所憾者，天资愚笨，百思而难得一，所喜者，多遇名师指点，多有浅见，本书或可代表求学十年的小结。本书在信息化与经济制度变迁、信息化与政府职能转变、信息化与企业组织变革、信息化与人力资产类型转换的互动关系的分析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甲申年仲春

目 录

导言	1
1 信息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1
1.1 国外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研究	1
1.2 国内的研究	6
1.3 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9
2 信息化与制度变迁	15
2.1 中国的信息化社会	16
2.2 技术决定论的沿革与中国技术倾向的信息化发展战略	21
2.3 “制度主义”者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及其检验	25
2.4 信息化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生产力 经济学视角	32
2.5 在信息化与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关系中促进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	40
3 信息化与政府的创新张力	43
3.1 信息通讯革命对政府干预规模的影响	43
3.2 信息化与下层制度创新对政府制度创新的张力	51
3.3 “三元经济”的现实与发展型政府职能的再认识	58
3.4 小结	66
4 信息化与企业组织变革的相互作用	69
4.1 企业的能力理论及其在通讯技术采纳问题上的适用性	69
4.2 信息化对企业组织效率的影响	74

4.3	流程重组与企业信息化的微观基础——企业对现代通信技术的采纳过程.....	81
4.4	技术与组织的良性互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关键问题.....	86
4.5	小结.....	91
5	信息革命、人力资本类型转换与收入分配.....	93
5.1	不同技术经济范式下的经济组织与人力资本投资.....	93
5.2	知识经济时代的劳资关系.....	99
5.3	信息技术经济范式下的就业与收入分配	106
5.4	“三元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本流动	111
5.5	小结	115
6	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	117
6.1	树立科学发展观, 信息化推进制度创新与发展理念创新	117
6.2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提升企业竞争力	126
6.3	实施知识发展战略, 为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134
	参考文献.....	145

信息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研究者的注意,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五”计划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以信息通讯技术以及信息化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日渐增多,本章将对国内外信息化的研究做出一概括性述评,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证。

1.1 国外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研究

对“新经济”研究最热烈的争论在于 ICT 对生产率的影响,计算机无处不在,而统计计量中却找不到它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为此计量经济学家改进了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最普遍使用的分析框架是国民收入账户,将资本分为 ICT 资本与非 ICT 资本,分别研究它们对各部门以及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影响。意大利的研究结果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 ICT 的持续投资对 90 年代资本生产率的增长产生正面影响,生产函数中资本贡献率增大了。欧洲中央银行发布的报告也表明:ICT 投资与生产对欧元区纵体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效应,但没有发现信息通讯技术对生产率影响的明显溢出效应。英国利用投入产出法对 ICT 的经济影响分析发现,从 1989~1998 年,资本深化贡献中有 55% 可归因于 ICT 投资,而这一比例在 1994 年以后是 90%,ICT 资本存量增加可解释英国 1989~1998 年 25% 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可解释 1994~1998 年 48% 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研究发现:信息通讯技术对澳大利亚生产率的影响,90 年代澳大利亚 ICT 投资对生产率增长的势头与美国的数据同样乐观,信息通讯技术在澳大利亚

的运用及其溢出效应至少使澳大利亚的生产率呈现 1% 的加速增长。

也有一些研究是针对企业层面的。欧洲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对 412 家德国服务业 ICT 投资与非 ICT 投资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影响进行分析,并未发现两者间的明显区别,也没有发现信息通讯投资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但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是否有明显改进取决于其能否成功实现企业重组。也有一些与此相左的研究结论,比如,罗马大学发表的研究报告《ICT 投资的生产率效应》,以意大利中小企业的数据库为样本,运用随机动态模拟方法分析了企业 ICT 投资的决定因素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ICT 投资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可从软件以及远程通讯基础设施角度进行,远程通讯投资与新产品及工艺流程显著正相关,软件投资增加了对训练工人的需求,导致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使企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

ICT 投资及其对生产率影响的不同研究结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存在“新经济”的争论。正如一些新经济怀疑论者所指出的:通讯技术的发展经历了“烽火狼烟”、“飞鸽传书”、“电报电话”、“电信互联”等发展阶段,作为信息传递的技术与人类沟通手段的微处理器与互联网并不会与传统的交流手段有本质的不同,ICT 技术只不过是一个装置,它使得人们原来并不可能的工作环境变得可能了,它的发明与电灯、空调没有本质不同,电灯使人们可能在黑暗环境下工作,而空调使人们能在炎热的气候中从事天气状况所不允许的工作,通讯技术只不过能使人们在从前不可能做到沟通的情况下进行交流罢了,作为一种发明,他们甚至认为其重要性还不如电灯与空调。在一篇名为《新经济能否与以前巨大的发明相比》的文章中,作者质疑了那种将互联网以及相关的信息通讯技术进步与第二次产业革命年间(1860~1900 年)给人类带来巨大变化的电力、电影、飞机等发明相提并论的说法。文章发现生产力的整个加速趋势归因于包括计算机、外围设备、远程通讯设备在内耐用制造品生产效率提高的趋势,而在耐用品制造业外 88% 的私营经济部门并没有生产率的复苏,如果除去非耐用品经济部门巨大的计算机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却下降了。在 1860~1900 年间的巨大创新及其在 20 世纪中的应用,从根本上提高了美国生活标准,相比之下,计算机及互联网的发展不能做到这一点,以摩尔定律为表征的计算机飞速的运算能力以及下降的成本,意味着计算机的巨大贡献存在于过去而非未来。

但是,更多的人士认为,信息通讯技术是一场革命性的技术,它的重要性在于其广泛的渗透性,被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的研究中,并推动与创造一系列

的创新集群,因而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技术,能够与它相比的只有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能源与交通技术。他们对索洛之谜的解释是,在两次产业革命间的巨大创新发生后要经过几十年后才能在统计中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他们看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如果没有产生立即的生产率提高只是因为旧有的经济组织为避免以前投入的资本与人力资源受到完全损失而处于重组中。

不管是否存在“新经济”的争论,各国在推进信息化研发及应用方面都有较大的增长。1996年,IT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的比重,在美国为13.4%,英国为11.7%,加拿大为10.1%,法国为6.0%;在1996~1999年间,美国IT投资年增长率达到38%,ICT资本存量迅速增长,ICT在美国非居民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比重接近35%^①。为理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国政府的政策反应,研究聚焦于政府对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与规制方面,发展着眼于为信息产业创造优惠的税收、人力资源、政策以及产业政策,规制是多方面的,如通讯标准制定方面、反垄断方面或者信息传播安全方面、网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网上税收政策方面、电子商务政策协调方面,在一些场合,发展与规制政策不可区分。

以促进ICT技术的研发创新体系而论,研究者认为存在多种模式,美国式技术创新支持体系既有国家军事部门的研究院,又鼓励私人部门在研发上的投入,以硅谷模式为代表的区域创新体系已成为各国政府效仿的对象,而欧洲的ICT技术研发体系更多的内置于一个更受管理化与组织化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对主导企业的支持以及在辅助企业间建立标准体系方面采取了很多举措。通过不同政策模式进行分类比较,研究者找出不同创新支持体系获取成功不同环境条件。一些研究结论认为,硅谷的成功与其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基于同事关系的技术社区分不开^②,分享信息、信任、宽容失败的文化对促进硅谷的技术进步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而一些欧洲的文献如Steven和Henrik(2002)^③指出,由于ICT技术的不同层次,其技术特性(技术的累积或专用特点)不同,企业在组合这些技术特性时面临不同的组织风险,因此存在能够创

① Paul Schreyer, "ICT Con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Output Growth: A Study of The G-7 Countries", STI Working Paper 2000/2.

② Saxenian, A. (1999), "The Silicon Valley - Hsinchu Connection: Technical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Mimeo, Stanford University.

③ Steven Casper, Henrik Glimstedt,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Systems, and The Internet",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17, No.2, pp.265-280.

造 ICT 领域竞争优势的不同技术路径,模仿硅谷模式不能在所有的 ICT 领域获得成功,尤其是在应用软件领域,促进工程师与管理人员相互承诺与信任,长期雇用合同的建立,这对于一些欧洲高新技术企业的成功极为重要。因此,ICT 技术的一些领域也完全可能在大规模组织化的制度环境中获得成功。

ICT 的规制研究突出地反映在互联网领域,互联网展示了无限多维的虚拟空间以及潜力巨大的商务应用领域,对互联网空间的交易治理机制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一些研究者指出,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自我治理机制突出地表现了社会生活中存在一种非经人为设计的“自发秩序”,互联网产生的内在秩序不是出自任何人的设计,而是源于千百万人的互动。一个例子是互联网上的广告发送规则的建立,在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推动立法并强制执行的情况下,网络空间诸如“未经接收人许可,不向对方发送广告邮件”的非正式规则,这类规则的建立往往是在经历过多次违规者受到“以牙还牙”报复式邮件发送制裁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如果互联网空间的治理完全如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述受一种自发规则约束,这也不合于现实。自从人类发明印刷出版业以来,政府就试图控制与影响信息传播,互联网这种巨量传媒当然不在此外。政府对互联网干预的传统理由是网络负外部效应导致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不一致,而出自“公共安全”、“公共利益”考虑而设计的公共政策也随处可见,当然,法律的制定与颁布是一回事,而法律的实际执行效果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互联网的规制受到政府控制能力与监测水平的影响,这是必然的,而随着信息安全与监测技术的进步,政府对互联网的干预程度与水平也会随着上升,有关的政策争论仍将继续。

国外更多的研究是基于信息通讯技术在商务以及行政领域中的应用,这些文献分布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供应链管理”、“战略联盟”等主题下,互联网技术在改善产业组织以及供应链管理方面展示了诱人的前景,结点企业具有充分动力利用信息技术获取自身竞争优势。电子采购、电子商务、电子联盟是企业信息化运用最主要的三个方面,B2C 可实现即时送货定额、减少存货、更好地了解市场、降低成本;B2B 创立了全球性市场,使制造商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供应商,能选择最有效的供应商,削减与产品相关的成本;信息沿着供应链或价值链及时传送,能极大地保证生产系统高度有效;许多随机发生的事件,包括由于设备损坏、生产停止、订单取消、订单加快、处理时间变化等将会得到及时处理;公司凭借产品销售的即时信息流,可以有效地预测市场,这将保证有计划的费用是被有效地利用,无计划的基本费用最小。企

业可以为自己创建各自的虚拟市场,也可由多个产业公司成立联盟来创建一个共同的虚拟市场,从而使得核心企业的供应链网络得以延伸。这类研究成果的丰富,并构成对传统应用理论的挑战,其原因正在于信息通讯技术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通讯成本,使得传统理论假设发生了变化,大量的新的应用理论随之产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西方学术界,运用多种理论探讨信息化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权威研究,当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曼纽尔·卡斯泰尔,他所著的《信息化城市》^①以及随后出版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的终结》三部著作,被认为代表当代信息社会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信息化城市》一书1989年首出精装本,引起极大反响,其关于信息化发展模式和网络化社会的研究成为了解和研究西方信息经济及其影响力的必读书。《信息化城市》一书的第一章就提出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指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导致了一个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对生产管理机制和政府机构产生根本影响,形成一个信息化发展模式与资本主义重组的互动作用关系,这个分析框架下的研究内容涉及信息技术革命与劳资关系重组、新产业空间形成、美国福利以及军备制度形成互动关系。这本书的研究是以美国的信息化社会为背景的,虽然其研究框架及使用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学者有借鉴之处,但其研究结论恐怕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总之,对通讯信息技术及其所引致的“新经济”研究中最为乐观的是一些技术主义者和未来主义学者以及一些商务应用理论家,他们对迅速提升的运算和通讯能力以及下降的计算机成本所导致的美好前景深信不疑;“距离的死亡”、“全新的商业模式”、“数字化生存”、“传统理论的终结”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演讲与文章标题中。对“新经济”最为严谨的分析来自于一些宏观经济学家,他们运用标准的国民收入账户分析方法去严格计量信息通讯技术投资及其应用对生产率的影响,虽然研究结果不一,并存在争论,而多数有分量的分析认为,“新经济”提法为之尚早。而信息化社会研究中最广为人知的研究是社会学者与制度经济学家,他们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在掌握大量原始数据基础上的分析,提供了人们认识西方信息社会的桥梁。从研究主题来看,涉及“网络空间的治理”、“信息技术与工作流程重组”、“电子商业与供应链管理”、“信息革命与劳资关系”、“通讯技术与研究开发创新”、“信息技术革命与新经济地理”等多方

^① [美]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面,研究视角与方法运用已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地步。但西方学者的研究毕竟建立在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于“信息技术与发展中国家”这个主题研究不足,一些有限的研究甚至在这方面还带有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色彩。笔者在社会科学研究网络电子图书馆(SSRN Electronic Library)检索到的一篇题为《新经济的制度框架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赶超可能》文章^①中,作者认为,“新经济”为转型国家提供的长期发展可能取决于后者是否具备合适的制度框架,文章建立起一套新经济指标以测量前苏联各联邦国家运用新技术的准备程度,发现了私有化程度与信息技术利用准备程度正相关,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斯洛文尼亚其信息化准备程度也最高,而私有化水平居于后列的南斯拉夫其信息化准备程度也居于后列,这篇文章的结论与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转型国家只有推进私有化,全面仿效西方国家体制才可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潜能,这当然是不科学的结论,也是为中国的信息化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1.2 国内的研究

我国的信息化实践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后,信息通讯技术以及与信息化相关的经济社会研究已成为国内的一个热点,相关文献极为丰富。这些成果可分为以下几类:

1.2.1 探讨信息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这些文献的研究角度不同,方法各有特色,基本思路在于分析信息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机理,计量信息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如吴刚、施利(2002年)^②;或从政策上探讨如何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发展高科技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推进经济快速发展,如李晓东(2000年)^③;也有从经济发展史角

① Marcin Piatkowski The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The New Economy and Catching - up Potential of Post - socialist Countries Http - papers.ssrn.com

② 吴刚、施利:《经济增长的引擎——信息化》,冶金工业出版社,2002年。

③ 李晓东:《信息化与经济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度来探讨信息化与工业化联动机制的文献,如李继文^①(2001年)。近年来,我国内需不振,一些文献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角度来阐述发展知识信息产业的重要意义的研究,如夏兴园(1999年)^②。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技术和网络通讯的发展,为中国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机遇,在发展网络经济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不仅如此,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其有利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而信息产业的一些部门如软件产业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随着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关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相关研究也将深入,从信息化与工业化关系角度探讨经济发展战略的文献还会逐渐出现。

1.2.2 探讨信息产业技术创新机制与战略

林毅夫(2001年)^③提出的要素禀赋假说认为,经济的最优产业和技术结构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与资本稀缺的现实,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所需的比较优势,如果它们进入或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它们的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上将没有竞争力。因此,他的结论是:信息产业的技术引进是我国实现低成本技术创新的主要内容,IT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最终组装等产业链上,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处于低端的计算机组装业,对IT业研究开发的大量补贴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邹薇(2003年)^④在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了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技术的适宜性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足够的人力资本与该技术的吸收应用能力相匹配,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失败的原因所在。她的文章是对林毅夫的一个呼应,但政策建议的重点在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吴敬琏(2002年)^⑤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一向注重制度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在谈到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时,经常产生认识误区,以为增加投入、加

① 李继文:《工业化与信息化在经济发展史中的内在逻辑性》,《经济学家》2001年第2期。

② 夏兴园:《论知识经济的兴起与经济增长点的选择》,《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③ Lin, J. Y. (2001),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The Inaugural D. Gale Johnson Lecture,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n May 14.

④ 邹薇、代谦:《适宜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与长期增长》,《2003中国制度经济学会交流论文》。

⑤ 吴敬琏:《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大研究开发、增拨资金、改善人才引进工作就是信息化本身,而能否成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取决于创造一个发挥创业者积极性、创造性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一些技术经济管理研究人员对于技术引进却有不同意见,他们以珠江三角洲的电子信息产业群为例,指出这些电子信息产业主要集中于中低端产品生产阶段,而芯片、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高端核心技术产品较少,不能掌握市场控制权,他们尖锐地指出:是满足于让跨国公司控制核心技术,还是成为一个拥有自我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制造中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①。

1.2.3 信息化应用模式研究

自1993年起,我国就实施了“金卡工程”,之后又陆续实施了“金关”、“金税”、“金盾”等“金”字系列的国家信息化应用项目。1999年及2000年先后提出了“企业上网年”与“政府上网年”,各地也先后提出“数字北京”、“数字江西”、“数字湖南”等信息化发展战略。为适应信息化应用的迅速发展,目前有较多的针对性研究,已经形成这一领域的较多文献,其内容既有产业层面,如农业信息化、制造业信息化、交通信息化、金融业信息化、商贸信息化;也有社会层面,如教育信息化、医疗卫生信息化、社区信息化、军事信息化。从信息化实施主体来看,涉及政府各部门,但更多的是企业。一些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企业信息化上,认为企业信息化尤其是制造业信息化是我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着力点,这方面的文献主题聚焦于“电子商务业务模式”、“虚拟企业”、“电子集市”、“现代物流体系”等方面。信息化应用的一个综合集成模式就是“数字城市”的提出,已经有多位学者立论^②。从这些文献的立论方式与研究内容来看,信息化发展模式似乎已在我国扎了根,任何理论与应用研究都不会对此忽视。

总结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在政府领导人与实业部门的推动下,国内对信息化背景下“知识经济”的讨论十分热烈,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尽管也有一些对“知识经济”的研究质疑,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信息化与信息通讯这个主题并没有出现像国外那样对“新经济”是否存在这

^① 傅家骥、雷家骥、程源:《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② 李京文、甘德安:《建设“数字城市”的内涵、任务与对策》,《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0期;承继成、王浒:《城市信息化的基本框架》,《测绘科学》2000年第4期。

一问题的热烈争论，或许对大部分中国学界人士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将信息通讯技术看做是一种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发展背景，一种提高国家与企业竞争力的手段。如何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应当成为学界关注所在，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大计的优良传统。

1.3 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1.3.1 选题依据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与信息化有关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也在趋于成熟。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深入推进，有关信息技术运用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一些问题也在不断暴露，因此，信息化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深入探讨与冷静思考。

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增强了人们对技术的崇拜，摩尔定律为技术主义者展示了一幅无限自由的远景，增强了人们的盲目乐观精神，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信心，由此导致网络技术与电子商务模式的迅速扩展。但另一方面，大量的低收入人群还是难以得到现代通讯技术的“溢出”效应，传统经济对于农村地区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也还是其就业与获取收入的支柱，如果“新经济”与“旧经济”不能很好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融合，“新经济”也是必然不能持续存在的，信息技术的研发与信息化的推进也就是在于此。基于上述理由，探讨新旧经济的融合机制应当是信息化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通讯技术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主导技术，在经济社会生活的渗透性强，政府也必然对此加以利用，电子政务的发展，给政府提供了增进效率的工具，也为政府的干预与权力集中提供了可能，如何在推进效率与加强干预方面取得平衡，将会是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中成功运用的关键；另一方面，在现代通讯技术扩散方面，不同的社会阶层存在不同态度：网络精英将会在推进技术进步与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上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政府出于对战略技术的重视与支持对此也难以拒绝；而一些处于传统经济的社会阶层则会由于新技术的扩散而